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

邹振环

【摘要】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既需要拓展自身的研究空间,亦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近代史研究是这样,翻译史研究亦如此。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新近面世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将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从清末起步、发轫,到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出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中国近代史学,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需要拓展自身的空间,如何拓展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专门领域,深入到近代其他专门学科的史学史研究,该书作者作了一次初步的尝试。

【关键词】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翻译史学史;起承转合;新领域

【作者简介】邹振环(1957-),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史研究(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9.2.63~72

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版)一书,是笔者新近完成的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1902-2000)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专题研究。该书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从清末起步、发轫,到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本文是关于该书研究范式、范围、取材、分期、结构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并试图阐明该书所做的探索,对于中国近代史和史

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翻译、中国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学史

翻译,是指以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将翻译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讨的称之为“译学”。蔡元培在1906年《国文学讲义》的叙言中指出“译学”可以分出以“空间”为特征的“横译”和以“时间”为特征的“纵译”：“外国语之为译学也，以此译彼域，以为地者也，谓之横译；国文之为译学也，以今译古域，以时者也，谓之纵译。”^[1](P390-391)]笔者所讨论的“翻译”是指以“空间”为特征的跨文化“横译”。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都意味着必须依赖知识的传承和横向的交流。人的知识可以有多种来源，或从古至今，或跨国越界，交流的结果是使人类生活在一个“纵译”与“横译”的世界里。全球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一件百衲衣，每个文化的地点都是诸文化的一个交流地。介于两种文化之间互动而生

成的“横译”活动,渐渐成为文化创造的新基础,一种新的生产空间^①。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致力于西书中译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介绍新知”,在民族救亡和“强国强种”的“危局”中,“翻译”也是一种民族生存的需要,甚至是一种文化体质的改造。正如当年王国维所言:“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2](P3)}“翻译”的结果是造成了近代中国一种“不中不西”或“亦中亦西”的混杂性的文化形态。

翻译活动在中国起源很早,《周礼》和《礼记》的相关篇目中都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述,最初“翻译”大多是指从事翻译的工作者,或有学者将之界定为近现代的一个新词^{[3](P204)},实为大误。中国古代有近3000年不间断的翻译活动,因而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也留下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翻译文献,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出现得相当晚,约在20世纪初才有了若干关于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篇文。中国翻译史学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翻译史学科的原理、方法作出理论的概括,可称之为中国翻译史学理论或中国翻译史学原理;二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历史的梳理,即笔者所要讨论的翻译史学史。中国翻译史学史和翻译史学原理,构成了中国翻译史学的基本范围,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翻译史研究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

2009年,湖南师范大学易经在其博士论文《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中曾讨论了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翻译史论由翻译史引论、翻译实践史、翻译理论史、翻译专题史、元翻译史论五大分支构成。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研究还可继续下分出中国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世界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区域翻译实践史等,每个系列还可在时间跨度上分出通史和断代史,专题史分支还可分出译家研究、译作研究、学科翻译史、翻译史与文化、翻译机构发展史、翻译教学发展史和其他专题,所谓元翻译史论还可分出翻译史论发展史、翻译史家评论和翻译史理论^{[4](P215-216)}。该文作者所说的“元翻译史论”,事实上比较接近本书的旨意,即翻译史学科的专门史,既要研究学科翻译史中不同体裁的翻译史,如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科学翻译史、民族翻译史、区域

翻译史、断代翻译史等,又要讨论翻译史理论的发展史、研究翻译史的专家及其成果以及翻译史论的一些理论。毫无疑问,在建立翻译史学的学科分支中,翻译学科的专门史学史,理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历史学研究比较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之庞大的历史叙事,尽管中国翻译史研究属于专门史之重要的一科,但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中国翻译史研究属于边缘之边缘,故一直未受到史学界的充分注意。近年来,一些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的论著也大多忽略翻译专门史这一门类,“中国翻译史学史”至今尚未进入历史学界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甚至未引起翻译界的注意,已经问世的几部《中国翻译词典》均未给“翻译史学史”设立词目。与《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研究直接相关的讨论,主要有谢天振《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和穆雷《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两篇论文。蓝红军《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一文,从学术史层面回顾了近30多年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指出了以往翻译史书写上呈现出整体史和碎片化两种取向,两者虽然各有侧重、功能各异,但两者背道而驰,愈行愈远。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翻译史研究分工逐渐细化,需要更为多样化的书写方式,以回应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作者提出了会通是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包括宏观与微观、史实与理论、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会通。上述论文着力分析的都是近些年出版的翻译史著作,有明显的“厚今薄古”和“厚今薄近”的倾向,且重点在翻译史家的个案或翻译史著作的评论,类似翻译史学批评,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基本忽略。因此,系统清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二、中国史学专门史:“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范围、取材与分期

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在“常”中求“变”、“变”中求“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旧”中求“新”、“新”中求“新”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而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曾

经的“常”与“变”以及以往的“旧”与“新”，常常会成为遗忘的对象，如此就造成了事实上学术史的某种断裂，需要我们不断编纂新的学术史来回顾和总结曾经的以往。一门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只有在全面认识自身学科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深入的开拓。《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即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之所以将时段确定在2000年末，是因为笔者一直以为真正的历史判断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只有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作者才能有一种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清晰度。将所要评述的翻译史研究成果限定在2000年前中国的范围内，还因为这一时空内所形成的成果，笔者绝大多数都曾亲眼目睹，或者仔细研读过，比较有把握能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个20世纪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系谱。作者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概括为“起承转合”^②，“起”是起步、发轫，“承”是承接、承势，“转”是演变、转折，“合”是汇合、会聚，即尝试通过有限的篇幅，对整个20世纪(1902-2000)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汇合、会聚的演变过程，作一番专门史的初步考察。此书堪称是一部简要的中国翻译专门史的学术史，故冠名“中国翻译史学史”。

黄焰结在《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文史天地》2014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翻译史学理论的内容，应该包括探讨翻译史研究过程的理论，即如何研究翻译史和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翻译史作理论探讨，他认为这些理论涉及翻译史科学、译史的书写模式研究(如何发掘、整理和编撰翻译史)、译史的元语言研究(对书写翻译史的语言话语的批评研究)、译史阐释理论探讨(批评以往的翻译史论、探讨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或框架来解释翻译史实)，以及对译家与译作的评价理论、译史批评理论、译史的定义、类型与特征、译史的目的与范围、译史的分期理论、译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过程等问题的探索；而关于翻译史研究本身的理论探索，则涉及翻译史学的学科

性质与研究对象、翻译史学史、翻译史学的价值与功能、翻译史学的层次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该文可能是汉文文献中首次出现了“翻译史学史”这一名称。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史研究。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定位与其学科本身的性质和内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学科范围的界定，又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性质。因此，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比较精确的界定。当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绪论”中就极力提倡专门史的研究：“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5](P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阐述各种专门史的具体做法，特别是文化专史，如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的不同做法。齐思和则进一步强调专门史又需有专题研究为基础：“语云‘欲速则不达’，世事且然，何况学术？故学者应先着手基本工作，从事专门研究，细目既明，始可察为专史，专史既出，始可谈到通史(编制课本，又当别论)。故今日所亟应从事者为专题研究，而亟有待努力者，亦无过于专题之研究也。”^[6]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指对中国翻译的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资料的梳理和历史的反思。《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既有对“翻译史研究”的考察，亦有对这一学科本身的反省，指以这门学科为对象，就其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换言之，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再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立在中国翻译史这门学科的基础上，它要对中国翻译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进行考察、梳理、排比和阐说，即中国翻译史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

作为翻译史研究的再考察，就中国翻译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言，可以分出翻译史史料整理、人的专史(重要翻译史家的生平及其翻译史观的分析)、翻译史编纂学的研究，包括翻译通史、翻译断代史、翻译专题史、民族翻译史、翻译地域史、翻译思想史、翻译流派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译文化史等；翻译史学史可以从研究的结构、撰写的角度和体例入手，有编年体的翻译史学史、翻译家的评传史、专

题翻译史学史等。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要致力于把握其内在联系,即不仅要重视整理翻译史研究的史料,也要整理和分析翻译思想研究史的资料,更需要辨析和评估翻译史著的编纂史,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建构一部脉络贯通、对历史轨迹流变有清晰陈述的翻译史学发展史。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主要讨论20世纪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也包括少量与此一系统直接关联的外籍学者以中文撰写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论著。考虑到著作在资料积累和体系建构方面,均超过一般的学术论文;且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大多先发表论文后经修改,编著成专门著作刊行,著作往往多包含有学术论文的研究内容,且这些著作大多作过修订,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作者的总体构想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演变。所以,《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在取材上,先著作后论文,一般已经被编入著作的观点、思想等,在论及相关著作后,不再重复列举论文,如马祖毅、王宏志、陈福康的论著中,许多章节曾多以论文形式先行在相关刊物上面世,稍后编入相关论著时作者多作了修订增补。因此,《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以著作作为讨论的主要材料和范本,较之一般论文而言要更可信。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论文,作者会专门进行分析,如贺麟《严复的翻译》、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曾锦璋《林译小说研究》、董桥《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等。由于20世纪50—9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学术研究特殊的实况,因此这一时段在地域范围上要特别注意将大陆、台、港、澳作为不同的系统分别加以讨论,以显示中国概念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撰写一部属于一个世纪的专门学术史,同样需要分期,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中,对很多翻译史著作的分期进行了讨论和批评。笔者一向认为,中国历史中专门史的演进,有其不同的变化时段与节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政治对于学术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作为一部专门学术史,其分期绝不能全然等同于政治史,而应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如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性恐怕不会超过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

同样,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的分期,以1872年清政府首次官派幼童留美作为节点,较之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更合理。有些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局,确实会带来或引发学术的蜕变,但是学术的变化往往不可能在很短的政治事件变革中完成。如西学东渐史,笔者多将晚明利玛窦的东来作为历史时期划分的界标,而晚清则以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作为起点^③。正是本着这一理念,笔者将刊载于1902年《中外日报》上的《译书略论》作为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起点,将1902—2000年分为1902—1949年、1949—1984年、1984—2000年三个时期。其中,1902—1949年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和初步发展期,1949—1984年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中国翻译史研究曲折演进的承势与转折期,1984—2000年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期。当然,历史分期是为了更清晰的描述翻译史学史的进展路线,是人为确定的,而历史发展实际上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具体内容的论述中,每个时期都会互有参差。

中国关于如何翻译的研讨,有着2000年的传统渊源,但作为中国翻译史系统的“窄”而“深”的专门研究,迄今仅有100余年的历史。而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史,确是仅仅在晚近20来年才取得了较大的创新与突破。尽管如此,对于这一为时不长的学科史,进行反省和认识,对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可能,而且很有必要。

三、《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结构及研究方法的探索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在方法论上首先采取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在文献整理上注重“辩章学术、考镜源流”^{[7][P1]},尝试较为清晰地呈现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发展的一般形态,在扎扎实实清理基本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运用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首先采用知识史的理论。学术专门史是知识史的一种,知识史研究是新近兴起的一门研究知识起源、发展、生产、类型、传承与传播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兴起受益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问世。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探究知识产生与演变的过程,通过分析知识的起源、传承、发展和演变,研究这些知识的类型、特征,在各个地方的传播与分

布,称之为知识谱系(Genealogy of Knowledge)。

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与侧重精英思想研究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不同,知识史的重点是研究学科演变史,研究知识门类的产生和变迁。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经过人类整理后变成具有意义的公共信息,这些信息再经过知识生产者的加工而逐渐呈现为知识。人类的活动包括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生产主要是通过个体,或者依靠个人为中心的师承脉络;在西方,中世纪的知识生产主体是教会,而在中国除了个体之外,很大一部分还通过寺庙、书院、书坊等机构生产知识。随着近代大学的兴起,特别是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大学也就成了中国知识生产的重心所在。东西方古代世界都有通过编纂辞书、丛书、类书、手册或百科全书,来解决知识的传承问题,由于知识的不断累积和增长,又通过索引来检索知识的搜寻问题。如何整理和保存信息,是古今东西方知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古代文献整理学科的出现,很大的作用就是对海量的知识信息的整理;近代以来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则大大促进了知识史的研究,比如,有了书籍史、文本史,专门研究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读者、书评者、图书馆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阅读史的出现,又改变了人们对知识史的看法。当代知识史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从学科“内部史”到学科“外部史”的拓展。学科“内部史”研究各个学科知识的产生、发展与变革,很少述及学科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学科“外部史”则注重学科知识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知识史研究恰恰既重视学科内部史,也关注学科外部史,尤其注重知识生产、传播的机构,如社会组织、知识创造者等所起的作用。二是采用比较方法,注重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史。《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方面着力于翻译史研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关注中国不同地区,如香港、台湾方面的翻译史成就,并注意不同地区的互动。

由“翻译”和“史学史”两个关键词组成的“翻译史学史”,是介于历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因此,中国翻译史学史显示学术研究的两重维度,即

一是中西维度,一是古今维度。“翻译”作为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交流的产物,自动显示出中西研究的广度,即“中西维度”;而作为史学著作,自然必须形成从“古今维度”来观照翻译史研究演变的厚度和深度。全书采取这两个维度来审视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的演变,时段上起20世纪初1902年的《译书略论》,下迄2000年底,以多叙述、少议论的方式,希望追求一种比较朴实的表达形式,尽可能在叙述中提出作者的见解。笔者重点关注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主题、资料积累和书写方式的演变,当然也不仅是排比史料,也会充分注意与中国翻译史密切相关的学术体制的变化,以及社会变革对于翻译史研究演变的影响,尽力将各个专题内容的讨论,还原到当时的思想和学术及其历史环境之中,避免“后见之明”式的裁断。在具体编排上,以时间为经,以具体的研究个案的主题为纬,尽可能地利用学术界关于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论著的分析和评价,以使这一全方位的透析显得公允和全面。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全书分上、下两篇,凡七章。其中,上篇为第一至五章,大致是线性式的纵向叙述;下篇为第六、七章,基本上是分科式的横向叙述。该书不是一种教科书式的写法,尽管在目次上显示出章节两级结构,每章分出若干小节,但实际上,作者会根据手头所掌握资料的多寡,在小节下再分出若干细目,因此,在分量上会出现某些不平衡,即有些小节下设的细目,分量甚至会超过其他小节的篇幅,这一点需要向读者加以说明。

在第一章“20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中,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有近3000年不间断的翻译活动,因而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出现得相当晚,约在20世纪初才有了若干关于中国翻译史演变的研究篇文。作者还指出,从1902年《译书略论》起至1949年,虽然仅仅是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早期阶段,但却有着一个很高的起点,参与研究的不仅有风云一时的大学者梁启超、胡适,也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郑振铎和阿英、哲学家贺麟。多学科研究者的参与,是早期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参与翻译史研究的不仅有文献学家郑鹤声,还有著名

历史学家柳诒徵,译史的内容在1930年代就进入了综合性历史文献学和通史类的著述。“翻译文学”概念,在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阶段已被提出并受到文学史家的注意,且很快运用于中国近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的研究,成为小说史编纂的一种角度。早期研究翻译史的学者注意介绍和借鉴海外翻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中国翻译史研究上多角度、多学科研究的特点,开创了一种比较宽阔的外部史研究的视野,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二章“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围绕“《翻译通报》与‘中国翻译史特辑’”、“俄苏翻译史研究的转向”和“翻译出版史料派”三个问题,集中讨论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翻译史研究如何承势与转折的过程。作者指出,1950年代前期,学术发展尚存很大的空间,随着自上而下意识形态控制和历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界的影响,造成翻译史研究的空间渐渐萎缩。蔓延中国大陆史学界近30年的政治对学术干预的惨痛教训,都反复证明了学术的问题理应回归到学术的本身。

在第三章“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翻译史研究管窥”中,作者指出,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两岸历经40多年对峙,同时形成了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新知识范畴,大陆、台湾与香港译坛学界互相隔膜。该章通过梳理方豪的明清之际西书中译史研究,释道安、张曼涛、裴源与王文颜的中国佛典翻译和刻印史的研究,20世纪60—80年代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以及1990年代的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指出1949年后的台湾翻译史研究是民国学术的继承者,在20世纪60—70年代末期大陆学术发展不正常的阶段,台湾地区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相对活跃,这些扎实的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借鉴欧美的翻译理论作了衔接工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填补了一段空白,使中国台湾与大陆在1980年代之后接续了学术之间的学脉关联,提供了建构中华翻译史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第四章“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中,作者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严肃

的学术在香港没有市场,香港社会也不重视中文翻译与中文写作。1960年代,在严肃的汉文学学术论著尚受冷落的环境下,出现了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和罗香林关于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著等,实在令人鼓舞。该章主要讨论了韩迪厚《近代翻译史话》、曾锦漳《林译小说研究》、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和《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两部重要的译书目录,以及香港的中文《圣经》翻译史研究、董桥《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等论著,据此管窥20世纪50—90年代末香港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特点。作者还指出,大陆在20世纪50—6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失去了正常学术研究的状态下,香港地区出版的这些翻译史著述,接续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传统,将近代翻译史重新作为一个专门论题提出,并以单行本论著的规模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香港区域翻译史和《圣经》翻译史详加讨论,这些代表性的研究,在香港既绵延了中国的学术传统,也开发了以英国学术为核心的西方学术传统。

在第五章“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中,作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渐渐开始复苏并重新活跃之际,学术界对于依靠翻译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意义,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掀起,大陆出版界出现了壮观的译作出版之大潮,形成了近代翻译史上自“五四”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也预告了又一次中国翻译史研究高潮的到来。该章通过中国翻译史专题资料的汇编、1984年:中国的“翻译史”年、《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等翻译家自述的出版、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以及译名问题讨论集《译名论集》问世等五个部分,从翻译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角度,讨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翻译史学史。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队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群体中不仅有老一辈的著名学者,如施蛰存等,也有青年一代的新锐学人,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研究所涉及的面向繁

复。第六、七章采用横向学科论述的方式,题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分“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科学翻译史料的清理”、“译学理论与翻译思想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译教学史”、“断代翻译史”、“民族翻译史与区域翻译史”、“翻译文化史与比较翻译史”、“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编纂形式上的史话本和图文版”、“以翻译史研究为核心的专题论文集”、“翻译词典中的译史资料与译史研究”、“汉籍外译史”等十四节,指出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外,书中也特别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翻译史和港澳台地区翻译史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20年这一繁盛的时期里,著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品种之全、立意之新,均属空前,不仅呈现出异彩缤纷,而且形成了所谓“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所提供的中国翻译史编纂的宝贵经验以及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对这一时期翻译史论著的总结和提炼,有利于今后翻译史的撰写工作。随着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多元化趋势,经济的多元化也影响到社会与文化,史学研究的走向也呈现出多元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几乎目前所见的所有不同内容体例的中国翻译史论著的编写形式,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过,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这种研究上的“多元格局”,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的中国翻译史研究。

四、中国史学专门史新领域的拓展

不难见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在学科归类上当属历史学科“史学史”专业下的“中国翻译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属于史学史范畴。从20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研究发轫算起,迄今已逾百年,但却未见有任何专著来叙述这一繁复的演变历程。200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过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下),这是一部较为系统地反省20世纪历史学进程的作品,其中蒋大椿所撰写的第三章第三节“中国专门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史、物质生产史和科学技术史;中国的商业、交通、金融、财政史;中国的政治史、法制史、管理史、农民战争史和革命运动史;中国的

政党史、社会史、人口史、妇女史;中国的宗族、家庭和婚姻史、社团史;中国的民俗史、教育史、体育史;中国的宗教、迷信史、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中国的地域社会史和少数民族社会史;中国文艺史,包括中国的文字、语言、书籍、新闻、出版史研究,甚至中国的病态社会史也列入了讨论的范围^{[8](P319-392)}。可惜唯独缺了20世纪以来百余年轰轰烈烈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历程。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对翻译史研究本身的认识与探索,旨在促进译史研究的发展,对于构建中国翻译史的学科身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设广义的翻译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从翻译史到翻译史学史,再到翻译史学原理的研讨,对于建构翻译史学科的层级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一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旨在研究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历程,梳理和总结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学术成果,分析和阐明翻译史学在20世纪历史时段内自身发展的特点;注重翻译史著作的编纂体例、翻译史观念的演变、翻译家个人与群体的传记编纂等成就。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一书中写道:“翻译史的构成是现代翻译理论的头等任务。对自身的反思,就是自身的确立。”^④翻译演变过程的反思固然重要,对翻译史学的反思同样也是翻译史学科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

一门学科要有所开拓和突破,即需要拓展自身的研究空间,亦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近代史研究是这样,翻译史研究亦如此。“前沿”原指最前部的边沿,在史学研究中一般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作为前沿研究的成果,学术上领先的学者一般被称为“第一线学者”或“前沿学者”。衡量是否属于历史学的前沿研究,主要指标还是指是否具有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新观点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应该包括对研究新领域的拓展。近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已有了很大的突破,除了中国古代史学史、近代史学史和现代史学史之外,还出现了断代的《南宋史

学史》、《明清史学史》等；中国专门史学史研究，也有了一批开拓新研究领域的成果，如“中共党史学史”、“中国小说史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史”、“中国科学史学史”、“中国音乐史学史”、“中国法律史学史”、“中国陶瓷史学史”、“中国美术史学史”等^⑤，也有学者撰文讨论“中国体育史学史”、“中国绘画史学史”和“中国书法史学史”^⑥。建筑学界早已关注建筑史学史的研究，为纪念中国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的开拓者、近代第一个中等和高等建筑教育专业的肇建人刘敦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著了《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记录了几代学者对曾经为学科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刘敦桢先生的纪念文章，还收录了中国建筑史学的传承者关于建筑史学史的研究文章。或有将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合并讨论，如赖德霖《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学者陈平还编纂了《西方美术史学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诸园编纂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中国翻译史学史”亦属于新出现的专门学科的史学史，是指对翻译史学科自身客观历史进程的反省，即研究者主体对这一历史客观研究进程的理解和把握，这便是以撰著形态出现的中国翻译史学史。

五、余言碎语

论者评价《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坚持“务成曩美，毋薄前修”的批评态度，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对各种中国翻译史著述作出中肯的评价，且做到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作者不仅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与内外动因以及翻译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反思，也对于20世纪翻译史研究对新世纪研究的启示，也作了深入的思考^⑦。或以为《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澄清讹讹，富有批判精神，提出“翻译史学史”这一全新的概念，不仅有利于丰富史学史的研究，也有利于将翻译史的研究置于历史学的检视之下，全方位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该书不是急就章，作者在写作该书前在两岸四地作了相关研究和资料收集，尤其是囊括了历来被忽视的民国时期

及1949年以前的翻译史研究，还概述了台、港、澳地区的翻译史研究，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描绘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指出该书忽略了已有的中国口译史方面的研究；与台港地区相比，澳门的翻译史研究过于简略，也是该书的一个薄弱环节^⑧。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仅仅是编纂中国翻译史学专门史的首次尝试，除了上述论者提出的批评意见外，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改进之点：

首先，全书的重点放在翻译史的研究著作，不少作为研究前沿的论文或被忽略；翻译家个人传记在此时期出版亦不少，如王韬、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朱生豪、阿英、林语堂、梁实秋等翻译家传记，即作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虽有少许分析，但未能在著述中加以重点揭示。像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柯文（Paul A. 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两本传记，前者就严译与近代中国追求富强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剖析，后者重点研究了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中王韬的作用，从翻译史学史的角度，实在有专门研讨的必要。

其次，全书主要以国人的研究著述编排谱系，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忽略，类似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MacGillivray）《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07–1907）、英国传教士贾立言（A. J. Garnier）《汉文圣经译本小史》、英国传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圣经在神州》（The Bible in China）、美国华裔学者钱存训《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A Bibliographical Study）、巴纳特（Suzanne Wilson Barnett）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合编《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写作》（Christianity in China）等，或虽有述及，但未作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加以重点讨论。

再者，海外学者关于传教士中国文献西译的研究，如西方传教士理雅各等的中国经典英译的研究，理雅各女儿海伦（Helen Edith Legge）所撰的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牛津圣教书局1905年）^⑨，2002年美国勒亥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瑞德

(Norman J. Girardot)完成的理雅各学术性传记——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②,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有不少论文涉及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的研究论文^③,上述三点均未能在拙著中加以重点检讨。这些缺点和不足,有待后来者补正和续写。本书作者所做的仅仅是中国翻译史学史写作模式的一个初步尝试,21世纪初前十余年亦已有大量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的面世,希望不久的将来,即有形神兼具的21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新著的问世。

如何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21世纪初,朱维铮主持的“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研究”项目,提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应当扩大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主张中国史学史研究不仅要研究史学编纂学、史学思想史,也极力主张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史”。他指出,中国人很早就对域外历史感到好奇,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都受到来自域外的种种思潮特别是所谓异教信仰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形态。同域外文化的互动而促使本土文化传统不断畸变的历史,已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引起广泛注目。尽管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和“西学东渐”、留学异域等方面的考述,在中国早有实绩,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回应却比较迟钝,迄今为止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很少从“学”的角度去讨论这类中外史学的互动过程。他建议,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是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1]。当年,张广智和笔者曾被朱维铮委托主持该项目的第三卷,即“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相关卷次,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未能完成。张广智的部分构想和阶段性成果汇入其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笔者也在撰写该项目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属于中国近代史学交流史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一书。正是循着拓展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空间的思路,2017年笔者完成了《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编纂,相信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不仅填补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学科研究史上的一大空白,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也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附记:本文初稿2018年8月3—6日提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河北师范大学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首届中国近代史前言论坛:近代中国历史的阐释与文本建构”,并在大会报告。本文部分内容源自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版)的导论部分,特此说明。

注释:

① 参见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3.

② “起承转合”原是解说词、赋、曲、散文、小说等之结构,清代学者刘熙载《艺概·经义概》称:“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起承转合之间的关系,起中有合,合中有起,强调的是首尾呼应,而“承”与“转”兼顾“起”与“合”,为阐述之上下勾连,一脉相承,所以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参见邹振环《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承转合(上)》(《南国学术》2015年第5卷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承转合(下)》(《南国学术》2015年第5卷第2期)。

③ 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1—31页；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参见李露露、许钧《从“译中求异”到“异中求译”——安托万·贝尔曼《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解析》(《中国外语》2015年第2期)。

⑤ 中共党史学史,已出版的有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周一平《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中国小说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中国文学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合著《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科学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詹志华《中国科学史学史概论》(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音乐史学史,已出版的有陈永《中国音乐史学之近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法律史学史,已出版的有张维新、王立民《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周会蕾、王立民《中国近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中国陶瓷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赵宏《中国陶瓷史学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美术史学史,已出版的有乔志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⑥如戴苏川《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管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温肇桐《中国绘画史学史发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设计版)》1990年第4期)、金晓明《关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美术研究》2004年第4期)以及胡春涛、洪权《史学史学科背景下的书法史学史的探索》(《中国书法》2007年第2期)等。

⑦该书现有马清河译的《汉学家理雅各传》中译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⑧此书已由段怀清、周俐玲合作译为中文,中译本书名为《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吉瑞德以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为切入点的系列文章还有:Norman J. Girardot, "The ways That Was Trodden: James Legge(1815-1897)and the 19th Century Invention of Taoism", 33rd, ICANAS, Toronto, Canada, August, 1990, pp. 19-25; "Finding the Way: James Legge(1815-1897)and the Century Invention of Taosim." Religion 29, 1999, pp. 107-121。

⑨参见 Lauren F. Pfister, "Notes on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repres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Vol 4: Eastern Asia, ed., Bernard Hung-kay Luk, Toronto, 1992, pp. 219-224.; Lauren F. Pfister, "Discovering Monotheistic Metaphysics: The Exegetical Reflections of James Legge(1815-1897)and Lo Chung-fan(died 1850)", in 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s, and Hermeneutics, et al.,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13-254); "Reassessing Max Weber's Evalu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Jon Davis, Isable Wollaston ed., The Scology of Sacred Texts,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pp. 99-110, 以及 "James Legge's metrical Book of Poet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60, No. 1, 1997, pp. 64-85。

参考文献:

- [1]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王国维全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黄河清,姚德怀.近现代辞源[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4]易经.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36.
- [6]齐思和.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J].食货,1936(3).
- [7]章学诚,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8]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 [9]熊兵娇.百年翻译史研究的描述、批评与反思[J].中国翻译,2018(5).
- [10]杨华波.填补学界空白,指明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评介[J].东方翻译,2018(4).
- [11]朱维铮.史学史三题[J].复旦学报,2004(3).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Expansion of New Field of Modern History

Zou Zhenhuan

Abstract: Translation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3000 years in China. However, it was on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e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was investigated as an independent object of study. The newly published book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1902-2000)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is book, based on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and other literatures, outlin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evelopment and genealog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made a preliminary attempt on how to expand the special field of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go deep in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other special discipline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20th centu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istory of 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 introduction, elucidation of the theme, transition to another viewpoint and summing up; new field